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考察

蒋林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要:1949年至1966年国内外形势风起云涌,中国文学凭借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和文学价值,在意识形态输出、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研究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从外译语种、文类分布、作品主题、译者群体、出版发行等方面切入,对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进行整体性考察,发现其总体特征体现为:形成亚非语种多于欧美语种的外译格局;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学外译版图中占据绝对优势;翻译选材上侧重现实主义题材的当代文学作品;实施的是小组制翻译模式;官办机构在外译图书出版发行中处于支配性地位。这些特征的形成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总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6-0133-12

0 引言

1949年至1966年是我国主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开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肩负着对外宣传的政治使命,响应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参与了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进程,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统计的数据主要来自1949—1966年的《全国总书目》,《全国总书目》是具有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的图书目录,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每年中国图书的出版情况。本研究同时还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中国出版史料》,以及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内部资料。这些著作与资料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足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大致概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基于《全国总书目》的划分标准,将中国文学分为八大类别:(1)诗歌,包括中国诗歌理论、中国诗歌史、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现代诗歌;(2)戏剧,包括中国各地戏剧(如京剧、评剧、昆剧、川剧等)、各类型戏剧(如歌剧、歌舞剧、话剧等);(3)小说,具

收稿日期:2025-03-21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翻译实践报告主体框架标准构建研究”(yjg2501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蒋林,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史、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蒋林.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考察[J].外国语文学,2025(6):133-144.

体包括五四运动以前小说(如话本、章回、笔记等)、现代小说(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类小说)和当代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4)散文,包括回忆、杂感、随笔、日记、杂记;(5)通俗文艺,包括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等;(6)纪实文学;(7)文学集刊,包括文学全集、选集、专集、丛书、特刊等;(8)儿童文学。本研究统计的中国文学作品仅限于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不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译文。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成果不断涌现。倪秀华(2012)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与变化过程,分析了翻译文学作品在文类和诗学上的总体特征及其与社会政治语境的密切联系。李金树(2018)对“十七年”翻译批评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揭示了特殊语境下文化身份与翻译批评的关系以及翻译批评的本质。李金树(2020)还从翻译批评主体入手,探讨了“十七年”期间毛泽东批评话语的三大特征及其对翻译批评的态势和话语选择的影响。操乐鹏(2021)以译家书信和日记为中心,探讨了“十七年”文学翻译批评的场域、路径与进程。夏维红(2021)则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国家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分析其译介特点和译介效果,旨在揭示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有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成果中,大多聚焦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缺乏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视角。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从外译语种、文类分布、作品主题、译者群体、出版发行等方面切入,对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进行整体性考察,并揭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外译图书呈现的总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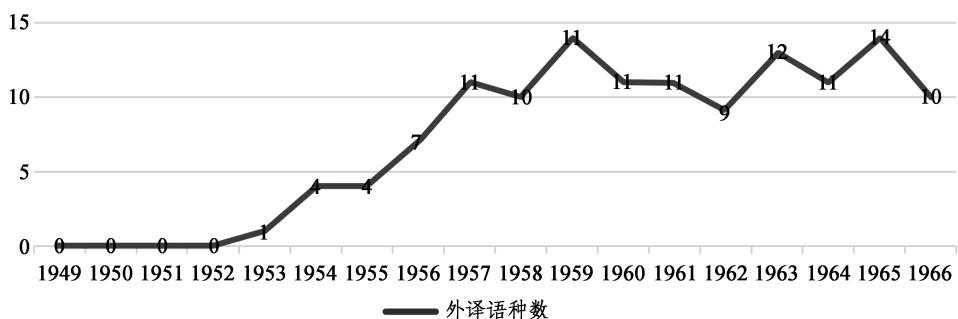


图1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语种变化趋势

1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整体概貌

1.1 外译语种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的语种共21种。其中,欧美语种九种,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荷兰文、芬兰文、瑞典文和匈牙利文;亚非语种有11种,包括印尼文、日文、越南文、缅甸文、泰文、印地文、阿拉伯文、乌尔都文、斯瓦希里文、波斯文和朝鲜文;另有世界语一种。1949年至1952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还处于空白期,及至1953年,

《离骚》《阿Q正传》《李家庄的变迁》等8种英译作品拉开了中国文学外译的序幕,之后外译语种数量逐年增加,具体统计如下:1953年为1种文版(英文),1954和1955年均为4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印尼文),1956年7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印尼文),1957年11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泰文、越南文、缅甸文、印地文、印尼文),1958年10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越南文、缅甸文、印地文、印尼文),1959年14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芬兰文、日文、越南文、缅甸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印尼文、乌尔都文),1960年11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印尼文、乌尔都文),1961年11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世界语、日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印地文),1962年9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世界语、日文、泰文、缅甸文、阿拉伯文),1963年13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世界语、日文、泰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印尼文、乌尔都文),1964年11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世界语、日文、泰文、越南文、朝鲜文、阿拉伯文、印地文、乌尔都文、波斯文、斯瓦希里文),1965年14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世界语、日文、泰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斯瓦希里文),1966年10种文版(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泰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斯瓦希里文)。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始于1953年,之后语种数量逐年增加,到1959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4种);1960—1962年有小幅回落,1963年起又有显著增加,及至196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4种),1966年降至10种。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外译语种数量呈现出波浪状的发展态势,中国文学外译语种在此期间累计130个语种,年均约7.6个语种;1949—1956年间,每年外译的语种为个位数,但从1957年开始每年基本维持在十个语种以上(1962年为九种),其变化趋势见图1。

1.2 文类分布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共有27部中国诗歌被译成八种外国文字,其中英文(14部)、法文(5部)、西班牙文(2部)、印尼文(2部)、德文(1部)、芬兰文(1部)、印地文(1部)和世界语(1部),涉及屈原、杜甫、毛泽东、郭沫若、袁水拍、阮章竞、陆灏等人的诗歌,如《离骚》《杜甫诗选》《毛泽东诗词》和《阿诗玛》等。在散文方面,共有13部作品被译成八种外文,分别是英文(6部)、德文(3部)、法文(2部)和日文(2部),涉及刘白羽、杨朔、冯之丹、朱波、秦兆阳、徐景贤等人的作品,如《海市》《农村散记》《黄浦江上的风暴》等。在小说方面,共有96部被译成十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55部)、法文(15部)、德文(5部)、日文(5部)、越南文(5部)、西班牙文(4部)、阿拉伯文(3部)、俄文(2部)、印尼文(1部)和世界语(1部),涉及吴敬梓、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叶圣陶、刘白羽、周立波、陈登科、萧乾、赵树理、杨朔、周立波、周而复等人的小说,如《三

里湾》《骆驼祥子》《风雪之夜》《山乡巨变》《青春之歌》《家》《林海雪原》《阿 Q 正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子夜》《暴风骤雨》等。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共有 44 部中国戏剧被译成七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31 部)、西班牙文(4 部)、法文(3 部)、德文(2 部)、印尼文(2 部)、越南文(1 部)和日文(1 部),涉及郭沫若、夏衍、老舍、田汉、曹禺等人的作品,如《屈原》《白毛女》《长生殿》《白蛇传》《雷雨》《茶馆》《关汉卿》等。在通俗文艺作品方面,共有 59 部图书被译成 14 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14 部)、德文(11 部)、法文(8 部)、缅甸文(5 部)、西班牙文(4 部)、越南文(3 部)、印尼文(3 部)、泰文(3 部)、印地文(2 部)、阿拉伯文(2 部)、俄文(1 部)、日文(1 部)、乌尔都文(1 部)和世界语(1 部),涉及冯雪峰、白行简等人的作品,如《雪峰寓言》《唐代传奇选》《中国古代寓言选》《中国民间故事选》等。在纪实文学方面,共有 72 部作品被译成 13 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29 部)、法文(8 部)、德文(7 部)、日文(5 部)、越南文(5 部)、阿拉伯文(5 部)、西班牙文(3 部)、印地文(3 部)、俄文(2 部)、印尼文(2 部)、缅甸文(1 部)、斯瓦希里文(1 部)和朝鲜文(1 部),涉及法显、巴金、杨成武、吴运铎、陶承、溥仪等人的作品,如《佛国记》《跟随毛主席长征》《董存瑞的故事》《从皇帝到公民——我的前半生》等。

在文学集刊方面,共有 47 部图书被译成 10 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22 部)、法文(8 部)、西班牙文(4 部)、德文(4 部)、越南文(3 部)、阿拉伯文(1 部)、印尼文(1 部)、缅甸文(1 部)、日文(1 部)、泰文(1 部)和世界语(1 部),涉及鲁迅、康濯、艾芜、峻青、马烽等人的作品,如《抗美援朝小说选》《鲁迅短篇小说选》《宋明评话小说选》等。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共有 690 部儿童文学图书被译成 20 种外国文字,分别是英文(115 部)、法文(89 部)、德文(82 部)、西班牙文(69 部)、印地文(62 部)、越南文(49 部)、阿拉伯文(35 部)、印尼文(32 部)、缅甸文(29 部)、俄文(27 部)、泰文(24 部)、乌尔都文(21 部)、世界语(17 部)、斯瓦希里文(15 部)、日文(14 部)、荷兰文(5 部)、芬兰文(2 部)、匈牙利文(1 部)、瑞典文(1 部)和波斯文(1 部),涉及叶圣陶、张天翼、杨朔、高玉宝、徐光耀等人的作品,如《叶圣陶童话选》《小兵张嘎》《鸡毛信》《大林和小林》等。

1.3 翻译选材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共翻译出版了 1 048 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古代文学作品有 126 部,占 12.02%,现代文学作品有 54 部,占 5.15%,而当代文学作品则有 868 部,占 82.83%,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对外文学翻译以当代文学作品为主。这一点在外文出版社的相关统计数据中得到了印证。1959 年 3 月 30 日,外文出版社在报给对外文委的《外文出版社介绍》中提到外文出版社在 1958 年年底前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共翻译了文学作品 161 种,其中有古典文学作品 20 种,五四时期文学作品 33 种,当代的新文学作品 108 种”(戴延年 等,1994:94)。这说明当代文学是外文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对

外译介的重点。

在对外翻译的古代文学中,涵盖古代诗歌、戏剧、小说、民间故事等文类,如《阿诗玛》《离骚》《唐代传奇选》《长生殿》《十五贯》《秦香莲》《儒林外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外译方面,主要侧重鲁迅、赵树理、丁玲、李季等人的作品,如《阿Q正传》《鲁迅短篇小说选》《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中,以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为主,涉及的主要题材如下:一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二是反映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作品,三是反映革命英雄和模范人物的作品,四是反映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毛泽东诗词》《土地回老家》《铜墙铁壁》《我们在建设》《保卫延安》《早晨六点钟》《董存瑞的故事》《不怕鬼的故事》《杨根思》《中国红军的故事》《山乡巨变》等。

1.4 译者队伍

中国在不同时期都有一批兼具很高本族文化修养和外语水平的翻译人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对外翻译或以其为主业的著名翻译家,这在世界翻译界是不多见的,也是对外翻译得以开展的前提(马士奎,2007:177)。从国籍上看,这一时期从事文学外译的译者以中国译者为主,主要由海外的华侨、留学的知识精英、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外语骨干构成。这些译者大多属于体制内人员,其工作待遇得到国家的有效保障,这使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

由于大多数译作实施的是小组制翻译模式,通过这种集体合作完成的译本往往不署译者名。据统计,在1949年至1966年间外译的1048部中国文学图书中,署名的译本仅80余部,占比不足8%,近92%的中国文学外译图书没有译者署名。这是因为大多数译作为集体合作的成果,在署名上也就无法落实到某个译者头上。与集体翻译一般不署译者名不同,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凡由外国专家完成的译本往往都会署上他们的名字,这些署名的外国专家包括英文译者沙博理、戴乃迭、巴恩斯、康德伦、勒斯特、路易·艾黎、威廉·怀特、詹纳尔、班以安,法文译者葛莱伯特,德文译者施华滋、葛来福、洛特·西赫罗夫斯基,西班牙文译者爱米尔尼娅·卡瓦哈尔,印尼文译者普·阿·杜尔等。外籍翻译家中署名次数最多的是沙博理和戴乃迭。在署名的中国译者中,主要有英文译者杨宪益、唐笙、颜惠庆、诚质怡、沈子高、黄开平、尚怀远、何永康、金隄、聂文权,法文译者朱文源、庞浩、唐浩、刘新舜,德文译者徐小丽,西班牙文译者何如,世界语译者李世俊等。

1.5 出版发行

在出版方面,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共有七家单位参与了中国文学外译图书的出版工作,分别是外文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新世界出版社、中国建设杂志社、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其中,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图书种类最多,共出版了992部中国文学作品,占出版总量的94.66%。无论从外译语种、外译数量,

还是译者队伍、发行册数,外文出版社都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其他六家出版单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外译图书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出版机构。1953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离骚》《阿 Q 正传》等八种文学著作的英文版,之后,外文出版社又陆续增加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芬兰文、荷兰文、瑞典文、匈牙利文、世界语、日文、朝鲜文、泰文、缅甸文、印尼文、印地文、乌尔都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斯瓦希里文等 20 余种外国文字。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在海外的发行和销售均由国际书店负责。国际书店 1949 年 12 月 1 日成立于北京,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图书进出口公司,其主要职责是发行我国出版的外文版书刊和外国出版的图书期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书店除主要经营书刊进出口业务外,还承担进口书刊的国内发行工作。1954 年前曾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九个城市设分店。1955 年以后,国内发行工作逐步移交新华书店,国际书店成为从事书刊进出口的专业公司。到 1957 年国际书店已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70 多家同行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业务关系,标志着中国文学外译图书对外发行网络的基本形成。

2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总体特征

2.1 形成亚非语种多于欧美语种的外译格局

从外译的语种上看,中国文学译成亚非语种达 11 种、欧美语种 9 种,形成了以亚非语种略多于欧美语种的外译语种格局(见图 2)。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外译中国文学图书累计 1048 部,其中 671 部被译为欧美语种,占总量的 64.02%;356 部被译为亚非语种,占总量的 33.97%;21 部被译为世界语,占总量的 2.01%。因此,从译介的图书种类上看,译成欧美语种的图书要远远多于亚非语种。在欧美语种中又以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为主(共计 661 部),其他欧美语种如荷兰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瑞典文所占比重极小(共计十部)。英文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中国文学被译介的第一种外国文字,而且也是译介图书种类最多的语种:共有 286 部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文,译介的文类总数及出版数量均高居榜首。除了英文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其他欧美语种依次是法文(138 部)、德文(115 部)、西班牙文(90 部)和俄文(32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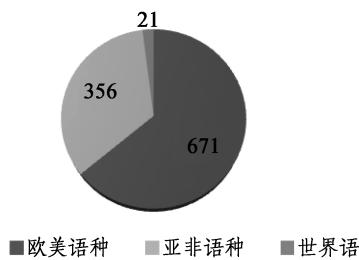


图 2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图书外译文版占比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亚非语种共 11 种,这些语种按译介的作品种类数量依次为印地文(68 部)、越南文(66 部)、阿拉伯文(46 部)、印尼文(43 部)、缅甸

文(36部)、日文(29部)、泰文(28部)、乌尔都文(22部)、斯瓦希里文(16部)、波斯文(1部)和朝鲜文(1部)。印尼文是中国文学被译成亚非语种中的第一种外国文字,1954年萧乾的报告文学《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印尼文,而印地文是翻译中国文学图书种类最多的亚非语种,共有68部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印地文。

在1949—1966年期间,中国文学外译语种的变化主要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相对友好,俄文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主要语种之一,但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文学的俄文翻译数量逐年减少,并从1962年起完全停止。与此同时,尽管当时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围追堵截”,但“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为有效和苏联竞争,就必须更多了解亚非拉等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因而与没有商业和政治合作关系的中国建立了文化上的交流”(何培忠,2006:51),这种文化交流给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创造了条件,由于英语为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选择英文翻译中国文学可以加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迅速扩大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为了获得第三世界国家对新中国的理解与支持,中国也加大了对亚非拉地区的宣传工作,外文出版社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外文出版社的规划纲要》(草案)中明确提出:“逐步扩大图书选题范围,增加外文的种类,特别是亚洲语文种类,大量地、有系统地和及时地把我国各种优秀的书籍用外文出版”(戴延年等,1999:60),中国文学在亚非语种上的逐年增加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与调整密不可分。

2.2 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学外译版图中占绝对优势

在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外译的1048部中国文学作品中,诗歌有27部,占2.58%;散文13部,占1.24%;小说96部,占9.16%;戏剧44部,占4.20%;通俗文艺59部,占5.64%,纪实文学72部,占6.87%;文学集刊47部,占4.48%;儿童文学690部,占65.83%(见图3)。从各文类外译的数量上看,儿童文学最多,其他依次是小说、纪实文学、通俗文艺、文学集刊、戏剧、诗歌和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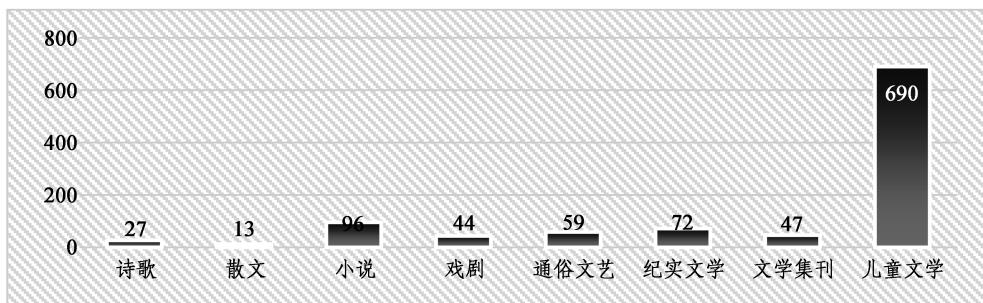


图3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图书外译文类分布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译成外文语种最多的诗歌是《毛泽东诗词》,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日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瑞典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阿尔巴尼

牙文、印地文、印尼文五种文版。在散文方面,外译语种最多的是秦兆阳的《农村散记》,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三种文版。《不怕鬼的故事》是小说中外译文版数量最多的作品,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世界语、越南文、阿拉伯文和日文 8 种文版。《十五贯》和《白毛女》并列戏剧外译文版的第一位,前者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文版,后者有英文、西班牙文和印尼文三种文版。在通俗文艺的译介方面,以《中国民间故事选》第 1 集为最多,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尼文、缅甸文、阿拉伯文和越南文八种文版。《跟随毛主席长征》是纪实文学中外译文版最多的作品,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地文、印尼文、越南文、日文和阿拉伯文九种文版。在文学集刊方面,以《新的家及其他故事》为最多,有英文、法文、德文和印尼文四种文版。就儿童文学外译的文版数量而言,以杨菊编、李天心绘的连环画《金斧头》高居榜首,有英文、法文(重印 3 次)、德文(重印 4 次)、西班牙文(重印 3 次)、俄文、世界语(重印 1 次)、荷兰文、芬兰文、日文、印尼文、印地文、缅甸文、越南文、泰文、阿拉伯文、乌尔都文和波斯文 17 种文版。

在所有中国文学外译图书中,儿童文学的外译数量占绝对优势。1954 年,外文出版社连续推出《少年先锋队员的故事》《鸡毛信》等多个作品的外文版,由此拉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序幕。外文出版社一直将儿童文学纳入历年的翻译出版规划中。1957 年,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制订的对外宣传方针是“连环画册要较多地介绍我国优美的历史故事,并应照顾儿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的兴趣”(戴延年 等,1999:76)。1959 年外文出版社在拟订的工作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加强对外出版中国儿童文学的读物和连环画。儿童文学作品具有简单易懂、篇幅较短、翻译难度低的特点,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外译语种和出版种类方面都远超其他文类。

2.3 选择当代文学作品译介是基于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作品涉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革命英雄和模范人物、阶级斗争等题材,这些主题大多可以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和客观,追求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反映和描绘。这些对外翻译的现实主义题材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功能,这是由这一时期中国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1959 年 1 月 28 日,外文出版社拟定《1959 年工作规划》,其中提出的业务方针是:“必须服从国家的对外政策,既要细水长流,又要积极主动。”“在地区上是以民族独立的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主,同时也兼顾到兄弟国家的需要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在对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来说,着重的是争取中间派,同时也照顾到左派的需要。”(戴延年 等,1999:92)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国际政治关系左右着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图书的发展趋势和翻译出版方向。

1962年7月12日,外文出版社在印发的《关于对外宣传艺术问题》中强调:“政治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是第二位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对外宣传中,要运用尽可能完美的形式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以期达到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戴延年等,1999:144)“十七年”文学与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洪子诚,2008:9)。而“十七年”小说这一文类在反映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建构民族国家上更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以革命战争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这两大类作品为代表。倪秀华(2012:28)指出,选择当代小说作为对外翻译的重点,体现了外文出版社致力于向国外介绍反映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由来和现状,以确立和塑造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和崭新形象。“十七年的文学场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统摄力。”(李金树,2022:126)

1949年至1966年间,选择翻译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当代文学作品是基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其目的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翻译这些作品可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制度和发展成就,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作品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翻译这些作品可以塑造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展示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三是推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翻译中国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为推动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作出贡献。四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作品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翻译这些作品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2.4 实施小组制翻译模式

中国早期的对外翻译主要是出于文人学者的自我意识,多属个人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外翻译则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成为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对外翻译的重视程度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马士奎,2007:179)。实施小组制翻译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图书的显著特征。以《毛泽东诗词》的英译为例。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振甫注释、臧克家讲解的英文版《毛泽东诗词》(19首)。1959年3月,外文出版社对该译本做了润色修改,并重新排印再版。为进一步做好毛泽东诗词的外文翻译工作,叶君健向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建议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经与他商量,他慨然同意,成立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他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和我为组员(我兼做小组一切事务性的组织和

联系工作),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袁作为组长,自然对原作的解释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乔冠华对原作的翻译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钱钟书和我主要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叶君健,1999:425)。“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同上:426)可以说,《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是作者、注释者、讲解者、译者、出版社编辑等协同完成的集体成果,从原文的解读到译文的润色,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的每一个环节均有多人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精雕细琢,语言准确流畅,成为其他语种译本的参考范本。

在实施小组制翻译模式中,小组成员来自不同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成员之间相互协作、讨论和提出改进意见,从而可以有效保证翻译的质量。例如,一些成员可以专注于翻译原文的难点和专业术语,而另一些成员则可以专注于对译文的语言和文化细节进行修饰和润色,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间的这种小组制翻译模式在后来的时政文翻译中被广泛采用,为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多语种外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5 官办机构在出版发行中处于支配性地位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由国家主导,负责翻译、出版、发行和销售的单位均为官办机构。这些机构扮演着翻译发起者和出版赞助者的多重角色,在人员调配、经费拨付等方面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无论是外文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新世界出版社、中国建设杂志社、中国佛教协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还是负责海外发行和销售的国际书店,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官办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出版发行中处于支配性地位,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控制较为严格,所有的文化机构都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管理的。政府掌握了出版、发行等渠道,从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政府成为中国文学外译出版发行机构的唯一主导者。其次,中国文学外译在当时被看作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由政府支持的官办机构负责中国文学外译的出版发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3 结语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间,中国文学外译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成为当时文化输出的主要手段,也是对外政治宣传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活动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是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意图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实现自我形象的塑造。”(倪秀华,2012:25-26)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是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国家力所能及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给予保障,故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规模之大、外译语种之多、出版发行数量之巨、参与人员之众,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并初步形成了亚非语种多于欧美语种的外译格局;在文类分布上,儿童文学在外译版图中占绝对优势;翻译选材以现实主义的当代作品为主;采取的是小组制翻译模式,多方人员协同合作;以外文出版社、国际书店等为首的官办机构在出版、发行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总之,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在语种选择、文类分布、翻译选材、译者模式、出版发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密切相关。因受篇幅所限,本文未涉及具体的文本分析及其在目的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这有待于我们的下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操乐鹏. 2021. “十七年”文学翻译批评的场域、路径与进程——以译家书信、日记为中心[J]. 中国翻译(4): 26-32.
- 戴延年,陈日浓. 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一、二)[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何明星. 2010.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 60 年[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 何明星. 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 何培忠. 2006.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金树. 2020. 毛泽东与翻译批评(1949—1966):特殊的主体/异样的批评[J]. 东方翻译(3): 16-22.
- 李金树. 2018. 批评主体的身份对翻译批评观的效应[J]. 外国语文(4): 128-135.
- 李金树. 2022. 与时代共名:新民歌运动与域外诗歌译介[J]. 外国语文(4): 119-127.
- 刘皋. 1999. 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马士奎. 2007.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倪秀华. 2012.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J]. 中国翻译(5): 25-30.
- 宋原放. 2001. 中国出版史料[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57. 全国总书目(1956)[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58. 全国总书目(1957)[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59. 全国总书目(1958)[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0. 全国总书目(1959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0. 全国总书目(1959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1. 全国总书目(1960)[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2. 全国总书目(1961)[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3. 全国总书目(1962)[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4. 全国总书目(1963)[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5. 全国总书目(1964)[M]. 北京: 中华书局.
-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6. 全国总书目(1965)[M]. 北京: 中华书局.
- 夏维红. 2021.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国家集中型赞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J]. 外国语(6): 73-82.
- 新华书店总店. 1955. 全国总书目(1949—1954)[M]. 北京: 新华书店总店.
- 新华书店总店. 1957. 全国总书目(1955)[M]. 北京: 新华书店总店.
- 叶君健. 1999. 回忆翻译《毛泽东诗词》[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中国版本图书馆. 1987. 全国总书目(1966—1969)[M]. 北京: 中华书局.
- 中国外文局. 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周东元, 亢文公. 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一、二)[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An Examination of Foreign Translation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JIANG Lin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66 was a tumultuous seventeen years i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position and literary value,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and shap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target languages, genre distribution, thematic content, translator demographics, and publication practic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translations into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outnumbered those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children's literature dominated the landscape of translated Chinese works;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with realist themes were prioritized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s; a collective translation model was implemented; and state-run institution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se trans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factors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hinese literature; foreign translation publications;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朱晓云